

自序

顧孟餘(兆熊, 1889–1972)的名字對今日大多數讀者來說可能都十分陌生, 少有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蹟, 然而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 他在學術界、政治界曾是一位叱咤風雲的人物。他早年赴德國留學, 專攻政治經濟學。返國後, 在蔡元培的邀請下他到北京大學教書, 擔任過德文系與經濟系的教授兼系主任, 又多次出任教務長, 與蔣夢麟、胡適等人齊名, 和李大釗也是好朋友。在任職北大之時他對政治即很感興趣, 有經世濟民的志向, 曾多次組織、領導群眾運動, 並在報刊上撰文介紹馬克思思想、肯定五四北京學生運動之歷史意義。1924年春天他加入國民黨, 開始步入從政之途, 參與北方國民黨的組織工作。1926年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歷任黨政要職。他進入政壇之始, 即受到汪兆銘的賞識與重用, 而與陳公博並稱汪之「左膀右臂」。此後他參與聯俄容共、武漢分共、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改組派)與擴大會議等, 也在汪兆銘任行政院長時主導黨政改革, 並擔任鐵道部長。英國大使卡爾(Clark Kerr)於1938–1939年有關中國政治領導人物的報告中說他「仍與汪精衛有親密的關係而知名」(“Reputed to be still a close associate of Wang Ching-wei,” FO 371-24699-59)。1938年底汪自重慶出走、與日和談之後, 他極力反對、勸阻不成, 與汪分道揚鑣, 後赴重慶加入蔣中正的抗戰陣營。抗戰時他曾擔任過中央大學校長。抗戰勝利之後, 他曾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

長(均未就)，李宗仁代總統時曾力邀他組閣，亦為他所婉拒。1949年之後，他在香港和日本與張發奎、張君勱、張國燾等人領導第三勢力運動。余英時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中國第三勢力「企圖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專政』的政權外，建立起一個以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為終極價值的精神力量」。1949年底「國民黨中的自由主義者當時奉顧孟餘為精神領袖……顧氏的影響力很快便擴張到黨外，成為整個『第三勢力』的領袖之一」，很可惜第三勢力「不能做什麼事，也不能影響政策」。¹ 1972年顧氏以84歲高齡病死於台灣。他的朋友陳克文說：在國民黨六位左派領袖之中，廖仲愷、鄧演達、陳公博死於非命；汪兆銘、甘乃光則客死他鄉，唯一在國土之內壽終正寢、得到善終的人只有顧孟餘。我們姑且不論他在政治上之浮沉顯隱、成敗功過，以人格操守來說，他畢生堅持自由民主理念，不忘情於中國苦難的人民，一生有為有守、能仕能隱，確有值得吾人讚賞之處。

本書研究顧孟餘的一生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筆者以前對顧孟餘之生平的瞭解也很少。2008年我參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主持的「蔣介石研究群」以及呂芳上教授主持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2007-2017，我於2008年開始參加)，逐冊閱讀、討論《事略稿本》後，開始對民國政治史有一些認識。2011年在接觸到周德偉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我才注意到顧孟餘的重要性。筆者要特別感謝周德偉的哲嗣周渝先生邀請我參加2011年5月22日在台北紫藤廬所舉辦的新書座談會，會前他將書稿的排印本寄給我，捧讀之下彷彿為我打開了一扇歷史之窗，讓我對於汪派(以及國民黨左派)視角下的民國史、國民黨史開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感受到在黨派、國族意識之下，歷史書寫要達到中立、客觀難度很大。後來，因緣際會因為汪榮祖教授的介紹，去拜訪李敖先生，其間提及周德偉，李敖大師慷慨地將他收藏的此書手稿影印本送給我。從周德偉先生秉筆直書、一氣呵成的字跡中我更能體會他的心境。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條線透過周德偉的回憶錄的引介，引誘我去探討顧孟餘的一生。

1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2018)，頁125、128。

周德偉是顧孟餘在北大時的學生，曾因顧的影響而加入國民黨，在顧孟餘任鐵道部長時擔任秘書工作，參與機要事務，也屬汪派人物。他在近代中國以師事、譯介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的自由思想而有名於世，倡導儒家與自由、憲政的結合。這一本回憶錄不但讓我瞭解湖南地區辛亥革命前後的複雜過程，也對周德偉年輕時激賞嚴復著作(尤其是《原富》、《群學肄言》等譯作)，而批評《新青年》、不喜歡胡適的思想傾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撰寫的對聯「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是周氏一生對學術工作與政治事功的深刻感受。書中縱論近代中國的人物與史事，而其中最為突出的一位人物無疑地是他的老師顧孟餘。我也逐漸領悟到為何在台灣我所接觸到的中國近代教科書中沒有這一位歷史人物。這主要因為他曾是汪兆銘身邊的要人，多次「擁汪反蔣」，1949年後又參與第三勢力，在美國與李宗仁等方面的支持下反共、批蔣。這樣的一位人物在國共兩黨正統歷史論述之中注定要被「銷聲匿跡」。

然而在周德偉的筆下，從1925年孫中山過世至1938年底汪發表「豔電」之間，顧孟餘被描寫為汪兆銘的「頭號軍師」、「台柱」、「汪之靈魂」，汪對顧之謀略幾乎可以說是「言聽計從」。的確，汪派的理論大師有二，一為陳公博、一為顧孟餘，汪對這兩個人十分倚重，而各有取捨。陳公博因為一路挺汪、至死不渝，又寫了《苦笑錄》而為大家所熟知。顧的名氣似乎不如陳，然而事實上汪的重要思想與決策，包括他革命理論之演變(如從肯定馬克思主義到否定「階級」觀念、否定「三大政策」等)，1927年武漢和平分共、1930年「太原約法」、1931年底汪蔣復合、1932年後汪任行政院長的政策與人事布局等，都深受顧的影響。周德偉指出「蔣氏知道顧孟餘能包辦汪精衛之事」。周也說顧孟餘在汪的身邊也精心維繫自己的軍師地位，「余察顧雖為汪之台柱，然自十三年識汪後，非奉汪之邀不入汪邸，或由汪親自訪顧，或用電話聯繫；凡汪召開大宴會，顧每先到後退，不欲與人多言，藉保其軍師地位之尊嚴。顧揣知汪之不能容納其意見者即不發言，汪本身亦有多方關係，言論龐雜，多言無益，或反遭多方之疑忌」。這些描述都點出顧在汪身邊的關鍵地位。周德偉的回憶錄中無疑地也有一些個人的偏見、記憶的錯誤等

嚴重缺失，也在某些地方誇大了顧的重要性，然而我覺得如果中國近代史中（尤其是國民黨史、汪兆銘研究、第三勢力的發展等）缺少了他所描述的這一塊「被遮蔽的歷史」，我們所理解的過去必然是不完整的。

在國共正統的歷史論述之中，改組派、汪派分子乃至「第三勢力」的歷史與人物一直不那麼受到重視，對其所做的評估也是非常負面的。簡單地說，他們成為隱藏在歷史角落的「失敗者」。然而如果不從「成王敗寇」的角度來做論斷，這些邊緣的聲音在與主旋律互動的過程之中，或許也能夠映現出歷史中鮮為人知的複雜面貌。這樣來看「失敗者」的故事或許不是毫無意義的，可以幫助我們省視成功的代價與成功者背後的陰影。

出於對顧孟餘一生經歷的好奇心，我開始搜索這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上「或隱或現」的歷史人物。我發現他本身留下來的材料不多，沒有出版過著作集、回憶錄，沒有口述訪問錄，更沒有任何一本有關他的專書。其他汪派的要角，如陳公博、高宗武等留下回憶錄；陶希聖、周佛海、陳克文則留有日記。顧和他們截然不同。經過好幾年的摸索、沉浸、耙梳，一點一滴地蒐集材料、整理排比，我終於完成這一本三十多萬字的書稿，希望能把顧孟餘帶回我們的歷史視野，補足被國共正統歷史論述所抹去的一面。在探討了顧的一生之後，我覺得他針對二十世紀中國的核心問題所提出的許多想法並未過時。他在早期從政之時是汪身邊的「諸葛亮」，為汪出謀獻策，是瞭解汪思想變遷的一位關鍵人物，奠定了改組派的核心理念；在汪發表豔電、建立附日政權之後，顧極力反對，顯示汪派之中亦有主戰的觀點，此後顧與汪分道揚鑣。雖然如此，顧在1940年代之後所從事種種的努力與汪派的政治理想仍有很深的關連。唯一的差別大概是他沒有走上所謂「附逆」或「漢奸」之路。1949年之後他與張發奎、張君勱等推動「第三勢力」、批判蔣氏父子威權統治與中共極權政治，支持台灣的民主化，也是順著早期肯定自由民主的思路而產生的。

周德偉將顧孟餘描寫為「汪之靈魂」，此一論斷可能會引起爭議。顧汪在反清革命時雖均為同盟會成員，然兩人並無聯繫（顧在入黨前與蔡元培關係較深）；1938年底汪出走河內、與日和談，顧則支持抗戰，

兩人亦分道揚鑣。汪顧的密切交往主要是從武漢國民政府時期至他出任鐵道部長的階段(約1926-1938)，此時他與陳公博無疑地是汪的「頭號軍師」、「左膀右臂」。然而如果我們將「汪」解釋為「汪派」而不只是汪一個人，而是在汪身邊的一群人，其政治立場與利害關係大致相同，不過也有許多內在分歧的複雜結合，那麼顧的一生及其理念或許可以反映汪派分子在一般人所認定的「主和」、「漢奸」等標籤之外的其他面向。

筆者之淺見是：顧的思想歷程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汪兆銘個人與汪派思想的變遷，乃至於汪過世之後汪派分子的處境與作為等議題。長期研究民國史的山田辰雄教授在他的《中國國民黨左派之研究》(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一書中指出：作為國共之間反共、反蔣的「中間派的改組派」，其政治理論與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現代意義。改組派批判蔣中正的集權獨裁，主張強化黨的領導權、黨內民主，實施「民主集權制」，同時認為需喚起民眾普遍參與，實現國家的民主化，他們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要聯合一切被壓迫的民眾，實現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則質疑中共的階級革命，與中共領導下日益激進的工農運動。在反共、批蔣的鬥爭之中，改組派對近代中國追求民族獨立與社會變革的構思有其重要性。

顧孟餘的政治經歷和他思想主張一樣重要。讀者可以把他的的一生視為一個獨特的旅程，從他的眼中觀察二十世紀初年以來在內憂外患下，中國所經歷痛苦、動盪的轉型歷程，也可以具體地瞭解國民黨聯俄容共、蔣汪鬥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美蘇冷戰等對顧孟餘一生的衝擊。我覺得他的一生經歷提供一個重要的個案，讓我們可以瞭解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國共鬥爭、國民黨內部派系競合，以及國民黨由興盛而衰亡的過程。

顧一生命運與汪兆銘、蔣中正兩位政治領袖有密切的關係。對他來說「得君行道」、「以義相交」是書生從政時努力追求而難以實現的一個夢想。他與汪交情深厚。他看到汪的一生一方面受到不斷變遷的意識形態之影響(從左傾到反共)，另一方面則為複雜的政治環境所左右。在此過程之中，顧孟餘(與陳公博)對他的政治理論之建構與政治行為之抉擇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就個性而言，他認為汪有激情、有領袖魅力，

然而過於衝動，又太受陳璧君影響，在關鍵時刻不接受勸諫，終於走向一個悲劇的結局。他和蔣之間也是恩怨糾結。蔣在內心痛恨顧孟餘等汪派（改組派）分子，甚至比擬共產黨，多次背叛過他，至遷台之後仍耿耿於懷；然表面上仍尊稱顧為「孟餘同志」，並多方籠絡，共謀國事。從顧孟餘所觀察到的蔣中正，一方面是工於心計、勾心鬥角、心狠手辣與表裡不一的政客，另一方面則是豁然大度、有禮有節、高瞻遠矚，在危急關頭會對同志施以援手的黨國領袖。顧孟餘退出政壇後，流浪異鄉、生活貧困，夫婦兩人在美國與返台後的生活費主要依靠蔣所給的津貼。

我長期以來研究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歷史，探討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的互動等課題。如果借用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的區分方式，顧孟餘和朱家驊、羅家倫、王世杰等人類似，在近代中國屬於「參政型知識分子」，而與其他兩種類型，亦即「議政而不參政的知識分子」（如胡適、傅斯年）與不問政治而專注學術研究的「純學者型知識分子」（如陳寅恪、王國維）有所不同。對於顧孟餘的研究一方面延續了我對中國近代「讀書人」與「書生從政」的關懷，看到從傳統士人到新知識分子的轉變；另一方面也開拓了民國史、抗戰史、冷戰史等研究領域，而對二十世紀中國重大歷史事件有了新的認識。

如前所述，顧孟餘曾留學德國，1916年9月在蔡元培的邀約下進入北京大學，1924年加入國民黨，1925年3月因領導三一八事件被通緝而離職。此後他棄學從政，而歷任黨政要職。為了研究他的從政經歷，我接觸到以往較少接觸的各類檔案與報紙，也熟悉了國民政府、國民黨的組織與運作，以及黨內的派系鬥爭等。本書也大量地徵引近年來問世的各種日記，而能精確地掌握顧孟餘一生事蹟，與他人對顧孟餘的評估。顧孟餘參與聯俄容共，遊走於汪兆銘與蔣中正之間，國共鬥爭、汪蔣分合及其與粵系、桂系、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軍人之合縱連橫，都影響到顧氏的命運。1949年之後，顧孟餘在香港、日本從事第三勢力運動，則揭示了一個美蘇冷戰時期以汪派、桂系合作為中心所形成的東亞地區的人際關係與資訊網絡。他在1949年的抉擇與留在中國大陸後來「自覺主動相應」地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如楊奎松在《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書中所分析的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等

人)，以及赴台知識分子在蔣中正的威權統治下困居海島而受其箝制的窘境(如雷震、殷海光、傅正等人)均有所不同。顧、張等人在國共的夾縫之中，以獨特的方式維繫了自身的尊嚴。顧孟餘從改組派到第三勢力運動期間所努力追尋的超越國共、建設現代中國的政治理想，在海峽兩岸對峙、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摸索未來的今日，仍然值得吾人思索沉吟。

在讀者閱讀本書之前，我約略地介紹一下他的性格與人們對他的評價，或許可以幫助讀者走進他的世界。在我研究顧孟餘的過程之中，我發現他的性格十分獨特，和清末民初「轉型時期」之中許多具有矛盾、衝突、糾結、悔恨的人物(如蔣中正、汪兆銘等政治人物或嚴復、梁啟超、吳宓、胡適等學者)截然不同；顧的思想觀念與行事作風較為平穩。他一生雖經歷政治上的起起伏伏、或左或右，然在思想上、情感上長期保持一致性與穩定性，而看不到太多傳統與現代的糾結、理智與情感的衝突，以及公益與私利之矛盾。如果我們採用西方學者普魯塔克(Plutarchus)、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等常用的「酒神」與「太陽神」二元對立精神範式，酒神精神代表打破禁忌、放縱慾望，解除一切束縛，復歸自然，呈現出痛苦與狂喜交織的非理性狀態；太陽神則象徵理性清明、操控情欲，追求明晰區分及重視個體性的文化表現。顧孟餘無疑地屬於「太陽神」類型的人物。

這可能出於幾種原因。第一，顧自幼受到西化教育的影響。他自年輕時代即進入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習德文，17歲考取公費，赴德國留學，能操流利的德文、英文與法文，又懂得西方的科技與政治經濟理論。他在生活與思想上都深受德國文化的影響，喜吃西餐、著洋服、讀西書、愛簽名(少蓋章)。他一生在思想與行為上比較徹底的西化或許是使他避免了傳統與現代糾結的一個原因。第二，顧在個性上深沉多慮、性情淡薄，說話要言不煩，做事則有條不紊，絕不衝動。這也是蔡元培、李石曾希望他加入國民黨之後能輔佐汪兆銘的原因(或說是以太陽神的理性來調節酒神的衝動)。第三，顧身體多病，因而行事較為謹慎。他年輕時曾患有肺病，後雖痊癒身體卻頗為虛弱，尤其是工作繁忙而無法承擔時，他的身體常出現一些病徵(他自己所謂「體弱不勝繁

劇)。在他擔任改組派領袖時，陳公博說「孟餘先生身弱多病，談一個鐘頭的話就要睡一天的床」。他一生中曾擔任過最重要的兩個職務，國民政府鐵道部長、中央大學校長，任職期間都因為工作繁忙而多次就醫。1935年12月25日他寫信給行政院長蔣中正時即說自己「近者我公主持中樞，海內人心莫不振奮。孟餘猥以疏慵，辱蒙提攜，原應勉力追隨……乃以體弱多病，未能拜命」；中大校長任內他覺得自己有「神經衰弱」。身體多病對他的性格有一定的影響，使他行事較為謹慎。第四，他的婚姻幸福和諧，在情感上從一而終。他的妻子韋增琬也是留德學生，對他不離不棄、照顧備至，然兩人沒有子嗣，而更增加了彼此相依為命的依賴感。

第五，在政治與經濟理念上，他信仰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所構想的國家藍圖，曾與汪兆銘一樣支持孫所主張的聯俄容共，為「左派要人」，吳稚暉說他是「額角頭上不刻字的共產黨」，然而他在思想上從來不曾認同過馬克思主義。從1912年在《獨立週報》與1919年在《新青年》撰文、1929年主編的《前進》雜誌，到1950年代在《大道》、《中國之聲》上的文章，都保持一致的學術觀點，反對專制獨裁（用他的話說是廢止「武裝同志專政」），也反對唯物辯證法與剩餘價值說、反對階級觀念與階級鬥爭論（強調互助）、反對以群眾運動的手法鼓動農村暴動，也不主張土地國有；同時他肯定歐洲的文官體制、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亦主張孫中山提出之「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等政策。顧孟餘在1927年七一五武漢分共之後，他首先質疑「三大政策」非孫中山先生所言，乃鮑羅廷所創，主張回到三民主義。他認為「國民黨……已共同反共，何來左右之分」。如果有所謂的「左派」是就「財政經濟分界」，顧的看法是和汪類似，主張「向帝國主義交涉，收回關稅、鹽稅自主，充實中央財政。廢除釐金……及地方一切苛捐雜稅，資以培養民力，另訂合理之中央及地方財政收支劃分辦法，一切地方稅需以法律定之，無倚輕倚重之弊，以收地方政府之向心，並得自行發展經濟，平均裁減各方兵員，以充實建設經費，實現中山之實業計劃」。²

2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頁321-322。

因此就性格與思想來說，顧孟餘其實並不難把握，為他寫一本傳記時比較困難的地方是：第一，他一生的經歷豐富，過程撲朔迷離，然而因其性格深沉多慮、謹言慎行，低調而不願張揚，留下的史料不多，尤其缺乏個人私密性的材料（如日記、回憶錄），因此必須要依靠各種零碎的史料方能拼湊出一幅完整的畫像。第二，撰述者必須要把他的一生放置在歷史情境中，將他所擔任的工作與特定事件、人際網絡和國內外的動態政經關係等勾勒出來。這兩點是本書撰寫時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人們如何來評價這樣的一個人物呢？世人對他褒貶不一。有不少人指出他個性膽小、多慮畏縮，書卷氣太重，而少了政治人物所需要的流氓氣。陳公博在回憶錄中檢討1930年改組派組織上的不健全時說「孟餘先生說他身體多病，是一個很好的參謀，而不是一個司令官」，改組派因缺乏領袖人物而歸於失敗。1938年底汪兆銘發表豔電、與日議和之後，顧持反對意見，陳璧君對他的評論是「學者膽小，不足以成大事」。1950年代與顧孟餘共同領導第三勢力運動的張發奎則說，顧孟餘與常人無異，個性過於謹慎小心、膽小怕事，「顧孟餘早年在汪精衛的改組派中，即有『取消派』之名，因為有很多事交他去辦，都是大事變為小事，小事變為沒有」。³ 1949年後隨蔣赴台的知識分子對顧孟餘接受美國人與李宗仁的資助，聯合張發奎等人從事第三勢力亦有所不滿。任職於台灣行政院僑務委員會的李樸生於1950年8月20日寫信給在香港的好友陳克文時表示顧氏從政的問題是雖為人正派又有學問，然書卷氣太濃而缺乏「梁山泊氣概」。1952年2月8日的信中李樸生又說：「存齋（顧孟餘的筆名）現在打起鮮明的旗幟來搞，所依附的卻是軍閥官僚，大失學者身份，必無好果。捧李失國人之同情，尤甚於汪昔日之捧閻也。現在他們在香港之作為我想是希望借美人之垂青，在『大世界』撈翻若干名位置而已！豈真反共乎！豈真反共乎！」⁴ 後來確實如李樸生所預料的，張發奎與顧孟餘等人所從事的第三勢力運動在國共對峙、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之下，終歸失敗。

3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下冊，頁143。

4 陳方正藏，〈李樸生致陳克文函〉，未刊。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看到顧孟餘的優點。1925年善後會議之時，胡適說顧孟餘人格「清高」。任職於國民政府鐵道部的王奉瑞說顧「清廉、有立場、守原則」（與曾仲鳴的「胡搞亂來」截然不同，兩人有天淵之別）。杭立武在口述訪問紀錄中說「顧是一位沉默寡言，有守有為的人」。傅斯年說「平情而論，孟餘清風亮節，有可佩之處，其辦教育，有歐洲大陸之理想」（1940年）。曾與顧孟餘共事的陳克文也十分肯定顧孟餘的個性與操守。他說：「顧氏一生對於革命和黨國大事，雖抱著高度的熱誠，但對於個人的權利名位卻看得十分淡薄。他雖然做過短時期的鐵道部長，和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校長，黨裡的中央委員和部長之類的職位，更經常少不了他的一份。不過這些黨國名器之落到他的身上，多半是當時的政治環境使然，並不是他主觀願望的要求，他也從未覺得這對他有甚麼光榮或者可以炫耀於人的地方；他始終保持著謙沖自退的學者風度，在左派領袖中固可以說他是對名利最為淡薄的一人，就是同時的黨國要人能夠和他一樣『為而不有』的也是鳳毛麟角，很不易得的了」。

梁漱溟與顧孟餘為北大同事，他也十分看重顧孟餘的道德與學問。1949年2月13日梁漱溟在重慶《大公報》第2版發表了一篇〈論和談中一箇難題——並告國民黨之在高位者〉，文中他推崇顧的人品與學問，他說「顧孟餘先生是今天國民黨元老中唯一人品學問最好之人。今天為國家設想，不應該讓國民黨完全垮台；相反地應當盼望它再興。但黨內黨外有資望之國民黨員，簡直沒有一個乾淨無疵之人，足以領導了。只有顧先生夠資格，我請李公注意在黨內推重顧先生，並協助顧先生。——但此事卻須以顧先生自己有志願有興趣為前提」。李宗仁後來邀約顧孟餘組閣，支持顧孟餘從事第三勢力運動與此一論斷應不無關係。

1950年代末期，當雷震在台灣宣傳自由思想、推動民主政治，想要組織反對黨時，他心目中理想的領導人物是胡適、顧孟餘與張君勱等三人（然遭到胡適婉拒，並說這三人都已垂垂老矣）。1972年顧孟餘過世時，錢穆對他的評價也是十分正面。「顧先生夫婦可算得是能隱的人物了。中國歷史上，不只看重顯在政治社會上層的人，更能看重隱在一旁的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偉大。如果我們只懂得前者，易於導引人性爭奪，而看重後者可使社會平衡，可使人心獲得安慰振奮」。陶

希聖等人則說「其愛國愛黨之真誠不可及，其持身之寧靜高潔尤不可及也」。趙惠謨（四川人，曾任立法委員）在1976年《傳記文學》所辦的座談會中對顧孟餘的評價最高，他說「我深知他除了學問淵博之外，其為人處事，實非常人所可企及！律己持身，有為有守。我自認為有四個字，可以表彰顧先生。曰：貞。曰：固。曰：清。曰：正」，可謂「今之完人」。

整體來說，在個性上深藏若虛與多慮畏縮是顧孟餘為人批評之處，「清風亮節」、「有為有守」、「為而不有」、「能仕能隱」，在人品學問上「有立場、有原則」，力求「乾淨無疵」則是顧孟餘為友人所稱道的地方。

在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之中汪兆銘身邊的重要人物顧孟餘一直是一個長期被人忽略、而認識不足的人物，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顧孟餘一生的功過，他一生豐富的經歷，尤其是他與蔡元培、胡適、汪兆銘、蔣中正、李宗仁、張發奎、張君勱等人的交往與互動，應該可以讓我們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有一番新的體悟。

本書能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也是一件令人感到欣慰之事。這一方面由於海峽兩岸的正統論述都對顧孟餘與相關汪派人物的歷史有所疑慮，也不太肯定研究這一批歷史上的失敗者的重要性。香港無論在空間與理念上均處於國共之間，又與大陸和台灣保持一些聯繫，此一形象與顧孟餘頗為相合。在二十世紀歷史上，香港與汪派及第三勢力聯繫在一起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汪在生前即將香港作為汪派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重心（在此發行機關報《南華日報》）。1949年後許多汪派人士以香港為棲身之所，顧孟餘也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運動，希望為未來的中國找到一種超越國共兩黨的政治理想。半個多世紀之後，海峽兩岸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由極權變為專政，展現「大國崛起」之勢，台灣則從蔣氏專政走向民主化與「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參見若林正文《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一書），然而如何能超越兩岸找到一條未來的路仍是一個猶待追尋的目標。在此情境下，能在香港出版一本有關顧孟餘一生的專書以見證歷史、思索未來，這應該是他所樂見之事。

汪兆銘與「汪派分子」的研究仍有許多可以拓展的空間，我覺得較大的挑戰其實並不在於要不要為他們「翻案」，而是盡可能地掌握歷史事實與還原歷史脈絡，在此之上才能進一步地討論「知人論世」的議題。本書的個案研究是為此所盡的棉薄之力，希望藉此可以讓我們更為認識過去研究不足的汪兆銘與汪派分子。我所撰寫有關顧孟餘的文章初稿完成後，曾在國史館所辦的「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2015年7月7-9日）上發表。因會議論文篇幅有限，會後應呂芳上館長的邀約，我將修改後四萬多字的長文〈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交《國史館館刊》刊出。2017年5月中我又應梁元生、陳方正與鄭會欣等教授的邀約，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民國人筆下的民國」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顧孟餘的晚年：從領導第三勢力到遠離政治〉（該文的刪節版刊於2017年8月號的《二十一世紀》）。這兩篇文章就是本書的雛形。後來我在此基礎之上，利用檔案與報刊資料等再做增補，並加上我所能收集到顧孟餘的分類著作目錄做為附錄。此書出版過程中承蒙友人劉季倫、黃自進、劉維開、王奇生等教授及毛升博士的協助，並經過前後多次的匿名審查。這些審查意見對於拙稿之文字、架構與史料運用、主要觀點等都提出細緻而嚴厲的批評，對書稿的修改有很大的幫助，謹致最高的謝意，當然書中所有的錯誤還是由我個人負責。

最後我想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宏志教授，由於他的邀約讓我有半年休假的時間到中大翻譯系訪問，得以心無旁騖地收集材料、撰寫書稿，本書的主要部分都是2017年上半年在中大梁銻瑀樓109號的辦公室內完成，窗外的藍天綠地與校園內的一草一木仍常留我心。在中大訪問期間，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陳方正教授將他所藏李樸生、陳克文往來信函交給我整理，提供了非常珍貴的一手史料。在訪港期間樹仁大學的區志堅教授亦多方協助我蒐集第三勢力之史料，又親自帶我去浸會大學圖書館查訪友聯集團的材料，檢閱友聯出版社、自由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機構的各種出版品。再者，日本關西大學沈國威教授於2018年兩度邀我去訪，讓我能全心全意地修改書稿，增補了與日本相關的部分。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山田辰雄教授賜序，讓我倍感榮幸。最後我要感謝中華民

國科技部的支持，本書為2015至2016年「蔣介石、汪精衛與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研究計劃與2016至2018年「專書寫作計劃」的部分研究成果。此書的完成承蒙計劃助理趙席篋、鄭巧君、王慧婷、林敏慧等人的多方協助，他們幫助我蒐集整理資料、修改格式、編製書目等。在出版過程中則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甘琦社長、編輯葉敏磊女士、陳甜女士與張煒軒先生等人的費心協助，敬表謝意。在本書撰寫過程之中家母賴芸馨（1924–2015）與家姐黃珍妮（1953–2015）於2015年上半年先後辭世，他們的過世讓我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時間。我常常想到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的教誨，努力追求孔子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的生命境界，謹以此書獻給我摯愛的師長與家人。

2017年6月4日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 2019年6月26日修改於南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